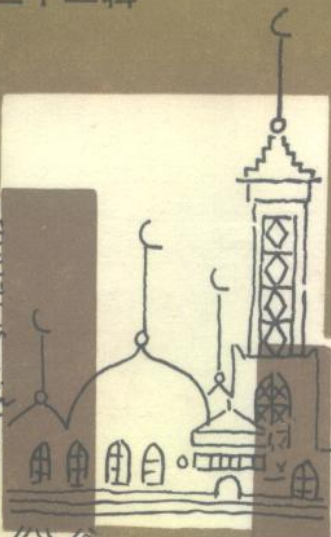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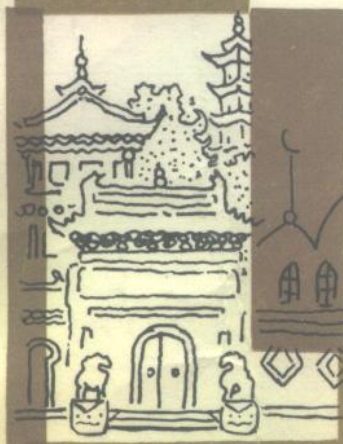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



黑龙江 宗教界忆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宗教界忆往

主 编 马维权
副主编 杨南欧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刘文新

封面设计: 陈 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省水利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省水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0.2印张·插页6

字数: 228,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07-02418-5/K·246

定价: 6.5 元

目 录

黑龙江宗教概述 (代序)	金 钰(1)
从领洗到主教.....	王瑞寰(10)
民国初期宾州教会小学.....	王瑞寰(124)
于斌本籍.....	王瑞寰(132)
若瑟屯兴建始末.....	王瑞寰(141)
七十年传教生活的回忆.....	刘焕波(144)
修女生活五十年.....	赵淑清(152)
法国传教士与海北天主教.....	李兴国(157)
呼兰教案钩沉.....	李兴国(161)
建国前后黑龙江省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简况.....	李兴国(164)
黑龙江省的东正教堂.....	朱世朴(176)
一位老牧师的自述.....	龚玉珊(190)
基督教哈尔滨市信义会散记.....	顾绍堂(219)
哈尔滨市基督教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基础.....	杨松山(225)
我的禅锡生涯.....	慈法口述 王占英整理(231)
出家五十年.....	成基口述 彭立、林雨整理(240)

黑龙江省三大寺庙·····	王柏松(245)
往事回顾·····	郑隆慧(257)
阿城清真寺·····	杨广全(275)
八十忆往·····	刘明哲主撰 赵家升整理(279)
一位为民族解放献身的道士·····	巴彦县政协文史办供稿(291)
道教在哈尔滨·····	李锡岐(295)
犹太教传入哈埠的情况·····	李锡岐(297)
一位尼僧劳模·····	王柏松(299)
在尼布楚条约谈判中的耶稣会士·····	李兴国(301)
光绪御赐神功普佑金匾·····	梁宗仁(303)
通河县三站庙会·····	吴士联 孟宪荣搜集整理(304)
乌裕尔河畔的喇嘛庙·····	敖乐奇(310)
黑龙江省天主教大事记·····	李兴国整理(314)
喇嘛台被毁目击记·····	乔 谷(323)
后记·····	编者(325)

黑龙江宗教概述（代序）

金 钰

黑龙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有史以来，自发宗教曾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长期存在过。在发掘出的古墓中，出土殉葬物证明黑龙江的古代先民们已有朦胧的原始宗教意念，即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对先祖亡魂的崇拜，对马、鹿、鸟、鱼等动物图腾的崇拜，以及后期的萨满信仰，这些都是原始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黑龙江先祖的信仰也随历史的发展逐渐由原始宗教状态向人为宗教阶段过渡。

公元8世纪中叶，来自中原内地的汉语系佛教已经传入黑龙江境内。据考古发现，位于现今宁安县渤海镇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城内外，就有9处以上佛教寺院遗址。原来为土著靺鞨人所信奉的萨满，已受到淡化或削弱。

明代，因其缔造者明太祖朱元璋自身经历中与佛教寺庙有过一段渊源，而格外倚重佛教。作为佛教的一个独立体系、而又富于民族色彩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开始在黑龙江西部蒙古族聚居地广泛传播。

但因藏传佛教仅局限于杜尔伯特旗（即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郭尔罗斯后旗（今三肇地区）、扎赉特旗（今泰

来)、依克明安旗(今富裕县)一带,其社会影响远不及汉语系佛教。

与佛教传入黑龙江的同一历史时期,道教也先后经由朝鲜半岛或中原内地渐次传入黑龙江境内。唐高宗时期,朝廷提倡佛道并兴方针,为此曾诏令全国各州,每州各设一寺一观,以此作为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措施。当时向唐王朝称臣纳贡的渤海国,实际上是唐隶属下的地方自治政权,其上层社会人士渐渐接受道教文化的影响。

公元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廷颁诏,号召鼓励移民关外,黑龙江汉族人口比例剧增,道教信徒和道教宫观也随之纷纷涌现。号称黑龙江龙门派道教的开山祖师的全真道龙门派16代弟子王合祥于清同治年间云游来绥化落足,并创建祖师庙观。清道光十八年,又有王教参道士来阿城松峰山太虚洞修筑海云观苦志修行。在同一时期,宾县、齐齐哈尔、嫩江、宁安、海林、讷河、呼兰等地,也相继出现大大小小的道观,形成宫观林立的态势。仅宁安、绥化、延寿、巴彦4县的城乡道观即有80余处。

元代,随大范围的民族人口的迁徙流动,伊斯兰教开始传入黑龙江境内。公元13世纪初叶,在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西征军中,有一支“西域亲军”编入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他们随军转战,陆续徙居黑龙江,成为黑龙江的早期穆斯林。

元初,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的天主教(元代称也里可温教)最先传入黑龙江这块土地,并广为上层社会和民间所接受。当时蒙古人中已有不少信仰天主教者,1287年发动叛乱的乃颜将军,便是一位老资格的天主教徒。在他统帅的军队中,不仅有大批天主教徒官兵,而且还在军中旗帜上缀有十字架的标记。

但是，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内的广义基督教涌入黑龙江，确切地说，是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炮舰打进来的。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契机，有些传教士就是同鸦片贩子一起坐着帝国主义的炮舰来到中国的。186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受遣先后来到阿什河（今阿城境内）、三姓（今依兰境内）各地，散发圣经，游行布道。继此之后，沙俄于1896年借助《中俄密约》的签订与修筑中东铁路之机，将俄罗斯正教（即东正教）打入黑龙江境内，在中东路沿线建堂传教。

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一位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自1838年罗马教皇十世谕令在满洲设立教区后，外国传教士便纷纷拥入黑龙江广大地区建教堂，办学校，传播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宗教思想。

清末民初之际，在黑龙江的外国教会，各自争夺势力范围，割据瓜分地盘，呈三分天下，喧宾夺主之势。

1928年以前，整个黑龙江地区的天主教统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他们在东北三省先后建起了满洲教区（1838~1898）、北满教区（1929年改为吉林教区）。1928年以后，由德国本笃会控制着延吉教区（辖牡丹江）和依兰教区（1937年改为佳木斯教区）；由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控制着齐齐哈尔教区。设在黑龙江的上述四教区的管理权限，全部掌握在外国神职人员手中；间或有极少数中国籍神职人员，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在教务或其它作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黑龙江土地上的外国传教机构和神职人员，不仅拥有教务方面一切大权，而且还凭借其雄厚的经

济实力，廉价购买土地，兴办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等慈善事业，以笼络人心，扩大影响，达到扩充发展教会势力的目的。他们甚至倚仗政治上种种特权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在信教与不信教的中国人中制造纠纷。1882年，一名外国传教士开枪打死呼兰地方行政官员，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慑于洋人的恫吓，竟将杀人凶手拱手让与外国领事馆查处；并且向天主教堂赔款3000两白银。此事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组织起来，烧毁天主教堂，杀掉外国传教士，引发一起著名的呼兰教案。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被人们习惯称谓基督教的新教，开始跻身于黑龙江，并有后来居上之势。从1886年英国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在双城建成第一座礼拜堂起，到1931年的40余年间，英国长老会，丹麦信义会，美国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浸信会、监理会、神召会、约老会等宗派接踵而来。新教也同先来的天主教一样，在黑龙江的土地上修筑教堂，兴办教会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其经费来源则由各国差会提供。

随中东铁路的修筑而在黑龙江插足的俄罗斯正教（即东正教），也是自成一统，反客为主，不容国人插手。自1896年清廷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之后，便为东正教的长躯直入打开了通道。从1898年在俄国人茹拉夫斯基主持下在哈尔滨建立起第一座东正教堂算起，到1931年的33年间，东正教在黑龙江土地上建起的教堂就有49座之多。这些教堂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中东路形成一个遍及滨绥、滨洲、滨长铁路沿线20个火车站点的网络。其辐射面之广，几乎囊括了东起绥芬河，西到齐齐哈尔；北自黑河，南抵双城的整个版图。仅哈尔滨市一地，就有东正教堂27座。在很

长一段时期，所有东正教堂的各项大权全部把持在俄国人或其他外籍神职人员手中。

上述被国人习惯称之为洋教的3种宗教，清一色地操纵在洋人之手。即使是与政治、经济并无直接关系的神权，外国人也肯轻易放过。这种有伤民族感情的历史状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主张和方针提供了历史借鉴与经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包括黑龙江在内的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罗马教廷紧随日本之后，通电承认日本帝国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从而使天主教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帮凶。

其他宗教团体，也无一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置于直接控制和利用之下。甚至某些宗教性的活动，也被纳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例如控制佛教僧侣为太平洋战争日军阵亡将士进行超度亡灵的诵经祈祷；指令东正教堂参与遥拜日本天照大神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对由英美等西方人主持教会的态度，开始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由于日本与美英的军事冲突，导致双方各种利益的矛盾。代表西方差会利益的某些教会，自然受日伪当局的排斥与遏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英美籍教牧人员被迫离去；一些其他西方国籍的教牧人员，也相继离开黑龙江。相形之下，唯有东正教还比较受到日伪当局的青睐。其原因是东正教会曾一再作出讨好日伪当局的姿态。“九·一八”事变不久，俄罗斯正教哈尔滨教区便急不可待地向全体俄籍教徒发出“必须和新国家协力一致”的呼吁。甚至当傀儡皇帝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之时，教区大主教梅列基又向流亡教廷提出“在

祈祷的时候也要为满洲帝国皇帝陛下及其臣民祷告”的申请，并且得到塞尔维亚流亡教廷的认可。东正教在伪满时期的顺利发展与特殊地位，完全是宗教与统治政权相适应的结果。

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及其活动，也受日伪当局的控制，旨在把宗教纳入为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侵略目的服务的轨道。伪满初期佛教派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赋有政治背景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哈尔滨极乐寺派法师为狱中临刑前的政治犯或其他囚犯开示说法；胁迫僧侣为阵亡的日本侵略军诵经超度等等，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也激发了宗教界有识之士的爱国热忱。黑龙江城乡爱国僧侣、道士，以宗教作掩护，暗中支持抗日斗争或迳自参加抗日队伍者不乏其人。巴彦县玉皇庙主持赵春霖，抗日初期积极为抗联募集资金，传递情报，后来又加入抗联做了交通员。1943年他被捕入狱后，受尽敌人的酷刑拷打，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交通员身份和抗联的情况，最后壮烈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光荣地追认为革命烈士。哈尔滨基督教牧师李毓麟，也曾热心地组织救护队，抢救和掩护负伤的抗日将士。

除上述6种主要宗教外，黑龙江还曾流传过日本佛教、犹太教、大宗教等一些外侨宗教，（只限于在侨民内传播，规模和影响很小）；以及在理教，天理教等一些类似宗教。日本投降，东北回归祖国后，这些宗教也都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1945年，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黑龙江，很快建立了民主政权，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也随即开展起来。在这场暴风骤雨中，旧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关系被打破了，那些拥有土地和房

产的寺庙、教堂，因曾以地租形式剥削过农民，自然也受到土改浪潮的冲击。加上一些外国籍神父、牧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采取敌对态度，甚至教唆部分信教群众破坏群众的土改运动，广大被激怒了的群众遂把城乡的一些宗教财产也当作土改的胜利果实给分掉了。那些曾经虔诚地企盼过神灵赐福的群众，从革命实践中获得真实的利益和幸福时，纷纷放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在土改运动中，除伊斯兰教作为民族宗教和东正教作为苏联侨民信仰的宗教而被完整保留下来外，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和信教群众均呈锐减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重新受到国家法律的确立。黑龙江也同全国一样，将宗教信仰自由纳入政策的轨道。在土改中被没收或挤占的寺庙教堂又陆续归还寺庙、教会，并重新开始了宗教活动。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都程度不同地干扰和冲击了宗教活动，致使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迨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扫四旧”的口号下，宗教界更是首当其冲地受到“红卫兵”狂热过火行动的冲击，全省所有的寺庙教堂无一幸免。不单供奉的偶像被悉数捣毁，就连宗教器物甚至建筑设施也遭严重摧残。各教的宗教经典、书刊、资材，或被焚烧，或被洗劫，绝少有幸存者。宗教职业者的家则被查抄，一些与宗教有关的物品被没收；有的还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罪名游街、批斗，甚至关进“牛棚”或监狱。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拨乱反正，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陆续落实包括宗教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宗教界人士中受迫害者被平反昭

雪，归还了被查抄的私人财物，恢复了政治名誉，补偿了经济损失。又在全省范围内落实宗教房产政策，归还了一些被挤占挪用的主要寺庙教堂，陆续恢复和开放一批宗教活动场所。

“文革”后的十几年间，全省出现一种宗教被限制压抑后的反弹趋势。现存6种宗教中除道教、东正教外，信徒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新教（基督教）徒有了成番论倍的增长，这一现象恰好说明宗教这一历史现象的自身规律，对它只能引导，不可压制。

长期以来，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即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在意识形态与世界观上，既有相对立的一面；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又有相适应的一面。

早自50年代起哈尔滨基督教牧师李毓麟就率先发起响应中国都督教反帝三自爱国运动签名运动，从而使黑龙江基督教割断与外国差会一切联系，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坚定地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开创了黑龙江基督教教务大权首次掌握在中国教徒手中的新世纪。在同一时期，哈尔滨天主教堂神父张德田，首先率众教徒勇敢地参加到“三自”运动行列中来。在其影响下，齐齐哈尔、海伦、北安、肇州、龙江各地的天主教徒也纷纷响应，积极揭发反动组织“圣母军”等在黑龙江的活动，并相继成立了爱国组织。1959年，全省天主教徒自选自圣王瑞寰为哈尔滨教区主教。从此结束了外籍主教垄断黑龙江天主教的历史，彻底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中华东正教会哈尔滨教区，自1956年成立中华东正教会之日起，亦脱离了与莫斯科牧区的隶属关系，成为由中国东正教教徒自己管理的教区。

总之，黑龙江宗教界的社会地位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宗教界一些上层人士和信徒，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行使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不仅在维护宗教界自身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也为黑龙江广泛的政治经济生活及社会安定做出了一定贡献。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虽有差异，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大目标是一致的。黑龙江省广大信教群众，在党和国家宗教政策正确引导下，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正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祖国和家乡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领洗到主教

王瑞环

自序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见圣；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这是吾主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祷词；也指示给了我们高尚的目标。试看吾主耶稣降世赎人，三年传教，广施恩泽，多显奇迹，其目的乃主名之见圣，神国之临格耳。



吾侪信仰耶稣者，既系修道之人，自当慎慎焉，兢兢焉，仰瞻芳踪德表，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热爱祖国，改过自新，修德立功，使其爱德之神国，临格于自己心中，使主之圣名发扬光荣；使主之恩泽，博施于众；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从而振兴中华，以利国福民焉。

省政协文史办嘱写回忆录，自觉抱愧良多。原因年逾耄耋，思想落伍，经前清、民国、日伪、始至社会主义祖国之新时代。以自身文化而言，正如缠足而放足，梳辮而剪发，华服而西装，新陈代谢，掺古而杂今，正力求赶上时代，学习过渡。恐文句难明，或辞不达意，致使阅者污目，听者逆耳。虽力求实事求是，但历年已久，难免有所出入焉。作此回忆录，系自身戒鉴，不足

为社会道也。敬请主内弟兄姐妹们和读者，推敲批判而斧正之。

虚度三万日，回忆愧何似，

愿主名见圣，尔旨行于地。

王瑞霖（伯多禄）

1988年圣诞节

幼年时代

我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宾县、宾州河西岸一个草房里。约在阳历6月由妈妈抱到圣堂领了洗，因那日是大圣宗徒伯多禄占礼，故取圣名伯多禄。授洗者是德高望重的老田神父本堂。我自开了明悟，每天晚课时必念“上天上享得已充满之福，圣名伯多禄”一生未断，常求这位大圣宗徒在天上助佑我改过修德，步其芳迹，荣主救灵。回忆我能同这位大宗徒如此投缘，得其圣名，亦有天主之圣意，预示将为宗徒之继者乎？

宾州在哈尔滨东方百里，城为长方形，南北三里三，东西三里六，周有土墙，墙外有深壕，四角有大炮台，以防强盗；东西南北有城门，东西大街有油、酒、米、面等企业，及德升乾，福升东，庆升义，广生当铺等。有人说，这些商行多为牛犊子家所开。据说其家本在吉林，是个大资本家。正街中有一惠济钱局掌握全县的经济，它所印刷的银票流通市面，叫作贴子，先是一吊当银洋一元，后来千吊当一元了。他家因出钱票发了大财，可也把老百姓坑苦了！我家是无恒产者，故此身受其害颇大。

在县西门外有个乱葬岗子，凡无坟地的贫困人家，将死去的人多埋在那里，我家去世的老人亦埋在都里。我还记得每年到圣教的追思已亡日（在十一月诸圣占礼次日），父亲就领着我，带着

圣水，去挖土填坟，哀痛而返。宾州城内，街道整洁。商贾辐凑，风化文明，人物清秀；由南向北，中流一河，即宾州河，水波清澈，青蛙蚌螺，银鲫穿梭；两岸垂柳，阴影婆娑，可以垂钓，可以高歌，可以游泳，可以仰卧，乃吾幼年游玩消暑之处也。其境东为二龙山，西临马海关，北依松花江，南望马鞍山。形如锅底，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据老人说：宾州是块福地，是聚宝盆，山清水秀，地灵人杰，我领洗之圣堂，即在城之西北角上。院有围墙，中有圣堂，青砖瓦舍，陪衬适当，菜田果树，鸟语花香。乃吾幼年进堂敬主，学习玩耍，恬息之所，平生难忘之处也。约1914年，孟广仁神父任本堂时，我入了要理班，开始学“要理问答”，因家中贫困，弟弟又小，故时学时辍。父亲为人理发，母亲代人洗浆。为了减轻父母之劳累，我亦做些家中零活及收拾园田地等，以维持数口之家。福昌是父亲给我起的小名，是有福乐昌盛之意，即希望一生之幸福也。在入学之后，袁老师说：“你不该再呼小名了，大名叫王瑞麟罢！”但过了两天他又说：“瑞麟太俗气了，改叫瑞周罢！”在我读下孟子（名子）时！阎老师说：“周朝已经过去很久了，还瑞它干什么，改叫瑞家罢！”所以我很长时间叫王瑞家了。到后来入了修道院，决心作荣主救人之大业，如范仲淹之以天下为己任，认为瑞家之心志也太狭隘了，故又更名为瑞寰了。这是随着年岁学习之提高，又以宗教感情之潜移默化，为了远大理想之志愿，竟致三易已名焉。

约10岁那年，四本要理，及有关必读的经文已全学完，在耶稣圣诞大占礼日，开了头次圣体，初领耶稣到心里来，感到十分甘饴，同时发了爱天主，当好孩子，学习守规，孝顺父母之誓